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4.03.019

及物性视域下非遗文本中创世神话的 和谐话语分析

——以土家族《摆手歌》为例

刘瑛^{1,2}

(1.中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2.吉首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摘要: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及物性系统与“和谐”生态哲学观,建构和谐话语及物性分析框架,从生态视角细化参与者与过程类型系统,探析非遗文本《摆手歌》的及物性语义表征和生态哲学观。其中的创世神话,主要通过物质过程、行为过程和心理过程表征天上人、地上人、动物、植物等共建更适合生存的和谐环境,蕴含着“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观。从生态语言学角度研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非遗中的创世神话,可以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及物性系统;创世神话;和谐话语分析;生态哲学观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4)03-0161-08

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是“生”的问题,“生”的哲学就是生态哲学,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①。受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影响,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生态语言学者黄国文提出了植根中国语境的生态话语分析路径——和谐话语分析,认为“生态”不仅仅指“生命有机体与其生存环境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的关系”,而且是被用来表示“和谐”,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语言与生态

之间的和谐”^②,受到国际生态语言学界的关注和认可^③。目前对和谐话语分析的研究,既包括对该范式理论基础、研究假定、分析原则的阐释等^④,又有相关实践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逐渐认识到传统文化和土著文化蕴含的生态智慧,这些智慧为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重要启示^⑤,还有学者关注日本里山话语模式^⑥、美国印第安传统文化土著文学^⑦、日本传统俳句自然诗^⑧等。生态语言学知名学者斯提比(Stibbe)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成为生态有益性话语的

收稿日期:2023-12-27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重点课题(XSP24ZDI008);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优秀青年项目(22B0535)

作者简介:刘瑛(1986—),女,湖南株洲人,博士生,副教授,主要从事功能语言学、话语分析、民族文化传播研究。

①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②黄国文:《外语教学与研究的生态化取向》,《中国外语》2016年第5期。

③Fill, A., Penz, H.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colinguistic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8, p.442.

④赵蕊华,黄国文:《和谐话语分析框架及其应用》,《外语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1期。

⑤Chawla, S. “Linguistic and Philosophical Roots of Our Environmental Crisis”, Fill, A., & Mühlhäusler P. (ed.) *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 Languag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London: Continuum, 2001, pp.115-123.

⑥Knight, C. “The Discourse of ‘Encultured Nature’ in Japan: The Concept of Satoyama and Its Role in 21st-century Nature Conservation”, *Asian Studies Review*, 2010, 34(4): 421-441.

⑦于美娜,冷慧:《印第安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生态观解读——以莱斯利·西尔科的〈典仪〉为例》,《黑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⑧Stibbe, A. “Haiku and Beyond: Language, Ecology, and Reconnection with the Natural World”, *Anthrozoos: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of The Interactions of People & Animals*, 2007, 20(2): 101-112.

来源^①,但从生态语言学视角研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成果甚少。

创世神话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凝聚着关于天人关系的认识与思考,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生态智慧^②。其中反映土家族先民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理解的创世神话,对土家族生态观的形成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主要收录在土家族《摆手歌》和《梯玛歌》中,包括《制天制地》《雍尼补所》等。土家族摆手舞于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摆手舞中演唱的歌谣《摆手歌》于2008年被列入湖南省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其经典文本由湖南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主编,岳麓书社1989年出版^③。《摆手歌》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受到民族学、艺术学、文化学等学科关注,姜爱、冉红芳认为《摆手歌》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④⑤}。著名语言学家、系统功能语言学创始人韩礼德(Halliday)明确指出“语言并不是被动地反映现实,语言主动创建现实”^⑥,即现实并不是事先存在的,是被主动建构的,语言在建构现实的过程中起关键作用。《摆手歌》中生态哲学观如何通过语言建构值得关注,但学界很少从生态语言学视角研究《摆手歌》中的语言结构和语言使用,揭示语言对各种生态关系的影响。作为适用语言学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具有强大的理论解释力、显著的问题导向,为生态话语分析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行之有效的理论基础^⑦。其中,作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核心语义系统之一的及物性系统,将现实世界、心理世界和抽象世界进行结构性识解,其小句过程、参与者等语义资源的运用特征,能反映出生态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协作机制。本文运用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及物性系统与“和谐”生态哲学观,建构和谐话语及物性分析框架,采用数据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和谐”生态哲学观指导下,研究非遗文本《摆手歌》中创世神话这一案例,考察其中的“人类来

源歌”及物性语义资源的分布特征,探析其中蕴含的生态哲学观。

一 和谐话语及物性分析框架概述

和谐话语及物性分析框架以系统功能语言学及物性系统为理论基础,并在“和谐”生态哲学观的指导下,从生态视角细化参与者系统和小句过程类型,结合土家族《摆手歌》的语境,阐释语篇中及物性语义特征和《摆手歌》中的生态哲学观。

(一) 系统功能语言学及物性系统

及物性(transitivity)是系统功能语法研究的核心概念,是概念元功能之经验功能在词汇语法层的实现,包括参与者、过程类型和环境成分等语义范畴,指人类对外部和内部经验进行结构性识解(construal),将这些经验片段加工成“过程类型”(process types)的语法模型,包括物质、心理、关系、行为、言语和存在6个过程和相应的参与者^⑧。物质过程是表示做某件事的过程,主要包括“动作者”(Actor)和“目标”(Goal);心理过程是表示“感觉”“反应”“认知”“意愿”等心理活动的过程,包括“感知者”(Sensor)和“现象”(Phenomenon),感知者通常是人;关系过程指的是反映事物之间具有何种关系的过程,包括“归属”和“识别”两大类,参与者分别是“载体”(Carrier)、“属性”(Attribute)和“标记”(Token)、“价值”(Value);行为过程指的是诸如呼吸、哭笑等生理活动的行为过程,一般只有“行为者”(Behaver);言语过程是通过讲话交流信息的过程,包括“言语者”(Sayer)“受话者”(Receiver)和“讲话内容”(Verbiage)等;存在过程是表示某事物存在的过程,只有一个参与者“存在物”(Existent)。物质过程和行为过程主要表征现实世界,心理过程和言语过程主要表征心理世界,关系过程和存在过程主要表征抽象世界。“意义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研究的重点,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构建和

①Stibbe, A. *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 (2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21, p.211.

②陶阳,钟秀:《中国创世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③湖南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摆手歌》,彭勃等整理译释,岳麓书社1989年版。

④姜爱:《土家族传统生态知识及其现代传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4页。

⑤冉红芳:《土家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意识探析》,《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⑥Halliday, M.A.K. "New Ways of Meaning: 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990(6): 7-16.

⑦苗兴伟,雷蕾:《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生态话语分析》,《山东外语教学》2019年第1期。

⑧Halliday, M.A.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ition).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4, p.106-109.

语法分析中意义重大。”^①何伟等学者遵循系统功能语言学“以意义为中心”的原则,根据生态系统参与者的生命属性,将及物性参与者分为“生命体”和“非生命体”,揭示生命体有无人为意识与认知的影响,更加直观地反映小句经验意义的生态取向^②。及物性系统 and 对其参与者的生态化延展,为研究话语中的生态取向、语言如何建构现实提供了可操作性的分析框架。

(二)“和谐”生态哲学观

生态哲学观(ecosophy)是生态语言学区别于其他语言学学科的一个重要维度,最早由挪威哲学家奈斯(Naess)1995年提出,是指与环境相关的一系列态度、价值和假说^③,后来被生态语言学者斯提比引入生态语言学。斯提比认为“生态话语分析是在一定伦理框架下进行的,这个伦理框架就是分析者的生态哲学观”^④。根据生态系统的类别,学界提出了不同的生态观。针对社会与生态,布克金(Bookchin)提出了“平等”,拉森(Larson)提出了“社会生态可持续性”,何伟、魏榕提出了“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的国际生态哲学观;针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斯提比提出了“生活”,何伟、张瑞杰提出了“和谐生态场所观”。为研究人与人、人与自然、语言与生态之间多层次的和谐,黄国文在中国传统哲学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研究假定和以“良知、亲近、制约”三条指导原则为主要内容的“和谐”生态哲学观^⑤。“和谐”生态哲学观的“以人为本”不是指以人的利益为中心,而是从人的问题出发,思考、分析和评估人的问题,并寻找解决人的问题的途径。“以人为本”与“良知、亲近和制约”三原则是一脉相承的:良知原则主要指生态良知,是自发的、源自内心的对自然的敬畏和热爱,是“以人为本”的自觉条件;亲近原则包含“差等”的和谐,指以人为基点从不同维度分辨人与其他生命体和外部环境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是“以人为本”的具体表现;制约原则是指受个人良知和修养、社区乡规民约和社会机构法律等方面的制约,是“以人

为本”的限制条件^⑥。“和谐”生态哲学观作为维持生态多层次和谐、动态平衡的指导性原则,既是判断话语生态性的参考标准,又是探析生态系统中生命有机体和非生命有机体相互关系动态变化的重要准则。

(三)和谐话语及物性分析

本文的和谐话语及物性分析框架,主要运用及物性系统描述和分析小句过程类型和参与者的语义表征。首先,从生态视角将参与者分为“生命体”和“非生命体”,前者进一步细分为“人类生命体参与者”和“非人类生命体参与者”。其次,在“和谐”生态哲学观指导下,运用“以人为本”的研究假定与“良知、亲近和制约”三条指导原则,结合语境判断小句过程类型和参与者的生态性,进而识别出有益性、中性和破坏性过程(如图1)。有益性过程维护生命有机体之间及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中性过程既遵从又违背生命有机体之间及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或表征生命有机体的客观属性和生活习性;破坏性过程违背生命有机体之间及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最后,考查小句过程类型的分布特征,在“和谐”生态哲学观指导下,探析生态哲学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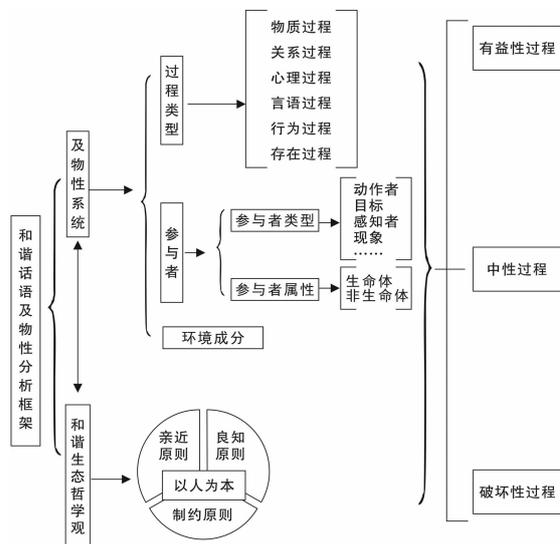


图1 和谐话语及物性分析框架

①陈瑜敏,黄国文:《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意义”》,《外语教学》2016年第5期。

②何伟,高然,刘佳欢:《生态话语分析新发展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65页。

③雷蕾,苗兴伟:《生态话语分析中的生态哲学观研究》,《外语学刊》2020年第3期。

④Stibbe, A. *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 (2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21, 11.

⑤黄国文,赵蕊华:《什么是生态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103—107页。

⑥赵蕊华,黄国文:《和谐话语分析框架及其应用》,《外语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1期。

结合黄国文提出的“功能语篇分析”步骤^①,运用和谐话语及物性分析框架,将研究过程分为三个步骤:(1)描述和分析。分析《摆手歌》中“人类来源歌”的小句过程类型和参与者的语义表征,在“和谐”生态哲学观指导下,结合上下文语境判断小句过程类型的生态性。(2)解读和阐释。结合《摆手歌》中的语境,运用“和谐”生态哲学观分析“人类来源歌”中生命有机体之间及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探究语篇中蕴含的生态哲学观。(3)评价和施为。结合时代语境与“和谐”生态哲学观,科学评价《摆手歌》的生态智慧和时代价值,服务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

二 《摆手歌》中“人类来源歌”的和谐话语及物性分析

《摆手歌》是土家族巫师“梯玛”和摆手掌坛师在土家族摆手歌舞活动中所唱的古歌,是一部土家族的百科全书和文学经典,对土家族历史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摆手歌》包括“人类来源歌”“民族迁徙歌”“农事劳动歌”“英雄故事歌”等内容。本文选取其中的“人类来源歌”为研究语料,包含天地开辟、人类和万物起源等内容。

(一)小句过程类型的生态性分析

话语的生态性分析涉及的内容,包括语言使用者对世界上一切事物和事件的“识解”(construe)与“识构”(Story),即存在于我们头脑中、影响我们看待世界的认知结构^②。在我们形成“识解”与“识构”的过程中,及物性系统的过程类型对意义的建构起着关键作用。和谐话语分析具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在“和谐”生态哲学观指导下,对《摆手歌》中“人类来源歌”的过程类型进行生态性分析,将其识解为有益性过程、中性过程和破坏性过程。

(1)有益性过程,是指表征维护生命有机体之间及其生存环境之间和谐关系的小句过程。一是通过心理过程和言语过程表征生命有机体的思想、情感和交流,体现生命有机体的心理世界,展现了其自主性和可亲近性。比如,“(雷公说)补所、雍尼记着了”,用心理过程表征了“感知者”雷

公具有报恩雍尼、补所兄妹的意愿。“(天上人说)燕子你各种子送啰”,用言语过程表征天上人与燕子交流如何给雍尼、补所送葫芦种子以避洪水之灾。二是通过物质过程和行为过程,表征生命有机体建设生命可持续性的物质世界。比如,“岩头搬起补在了,钉子拿起钉在了”,用物质过程表征了“动作者”张古老搬石头、拿钉子修天,体现了天上人改善宇宙生存环境的能动性。“磨子一下滚”“烧起两堆火”,用物质过程“滚”“烧”表征“动作者”雍尼、补所克服困难,延续人类生命的能动性。三是通过关系过程和存在过程,表征生命有机体互相依存及与环境和谐共生的抽象世界。比如,“毕兹卡哩,笋子一样生出来”,用关系过程表征土家族毕兹卡与笋子的相似性,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客家哩!毕兹卡哩!苗家哩!娘的肚子里生着的哩”,用关系过程表征客家、毕兹卡、苗家同源共祖、相互依存的关系。

(2)中性过程,是指表征生命有机体的客观属性或生活习性的小句过程。一是通过关系过程表征天、地等自然非生命体和天上人、地上人、动植物等自然生命体的客观属性和关系。比如,“天和地挨着的”,用关系过程表征“载体”天和地之间的空间关系,体现了土家族先民对宇宙空间的认知和想象;“张古老哩!胡子白白的”,用关系过程表征“载体”天上人张古老外貌、年龄等特征;“嘴没有脸没有嘛”,用关系过程表征“载体”人种的特征,反映了土家族先民对人种的模糊认识。二是用物质过程和行为过程表征动植物的生活习性,比如,“人给喜报忧报”“蚂蚁虫虫找着日子过在”……用物质过程表征了“动作者”乌鸦、野鸡等动物的行为,体现了土家族先民对动植物生活习性的观察和了解。

(3)破坏性过程,是指表征违背生命有机体之间及其生存环境之间和谐关系的小句过程。主要通过物质过程和行为过程表征生命有机体之间的冲突矛盾。比如,“(天上人)打了他”,用物质过程表征“动作者”天上人惩罚地上动植物,限制他们的活动,破坏宇宙的多样性和整体性;“大哥翅膀掐了哩”,用物质过程表征地上人抓雷公的激烈动作,凸显天上人和地上人的冲突,不利于地

^①黄国文:《功能语篇分析面面观》,《国外外语教学》2002年第4期。

^②黄国文,陈旸:《生态哲学与话语的生态分析》,《外国语文》2016年第6期。

上人与天上人的和谐关系;“你各天齐的水一次涨,人种莫留了”,用物质过程表征天上人决定消灭人种,不利于人类生命的延续;“懒腰伸在了”,用行为过程表征了李古老偷懒,耽误补地,造成地上坑坑洼洼,影响宇宙环境。

综上所述,生态有益性、中性和破坏性过程由多种小句过程表征。对小句过程生态性的判断,需遵循“以意义为中心”的原则,既要考虑小句过程类型和参与者的语义特征,又要结合语境并参照“和谐”生态哲学观。明确小句过程类型的生态性,是分析“人类来源歌”中人与自然生态哲学观的重要前提。下文将试着量化分析生态有益性、中性和破坏性过程在“人类来源歌”中的阶段性分布特征。

(二)“人类来源歌”中及物性语义分布特征

《摆手歌》中“人类来源歌”根据主题内容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次毁灭:万物过度生长,激化空间矛盾,宇宙转为混沌;第一次再生:补天修地,人类再生;第二次毁灭:贪吃雷公,洪水泛滥,人类毁灭;第二次再生:兄妹成亲,人类延续,万物和谐共生。通过分析“人类来源歌”中的 589 个小句,发现有益性、中性、破坏性过程的数量在四个阶段的分布存在显著差异(见表 1)。

表 1 “人类来源歌”小句过程类型阶段性分布表

过程类型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有益性过程	23.3%	60.8%	26.9%	66.8%
中性过程	20.0%	19.2%	39.9%	32.3%
破坏性过程	56.7%	20.0%	33.2%	0.9%

纵观表 1“人类来源歌”过程类型的阶段性分布,第一阶段破坏性过程占比远高于有益性过程和中性过程(56.7%>23.3%>20.0%),体现了生命有机体之间和宇宙生态系统中的矛盾。第二阶段有益性过程占比远高于破坏性过程和中性过程(60.8%>20.0%>19.2%),表征生命有机体之间和宇宙生态系统逐渐走向和谐。第三阶段中性过程占比高于破坏性过程和有益性过程(39.9%>33.2%>26.9%),呈现了生命有机体之间和宇宙生态系统的复杂关系,既有矛盾和冲突,又有合作与协同。第四阶段有益性过程占比远高于中性过程和破坏性过程(66.8%>32.3%>0.9%),体现了生命有机体之间和宇宙生态系统的和谐关系。由

此发现,“人类来源歌”体现了生命有机体之间和宇宙生态系统经历了从冲突走向和谐的动态变化过程。从冲突到和谐的四个阶段动态变化,能通过小句过程类型(见表 2)和参与者的语义资源(见表 3)表征。

表 2 小句过程类型的分布特征

阶段	物质过程	关系过程	心理过程	言语过程	行为过程	存在过程
第一阶段	16.7%	13.3%	13.3%	10%	28.3%	18.4%
第二阶段	66.4%	8.8%	4.8%	10.4%	5.6%	4.0%
第三阶段	52.5%	8.6%	17.2%	12.7%	5.0%	4.0%
第四阶段	40.3%	15.6%	12.6%	21.9%	6.8%	2.8%

表 3 参与者的分布特征

阶段	天上人	地上人	动物	植物
第一阶段	37.1%	5.7%	31.5%	25.7%
第二阶段	96.0%	2.0%	1.0%	1.0%
第三阶段	42.9%	48.1%	7.9%	1.1%
第四阶段	24.5%	56.0%	17.9%	1.6%

第一阶段:混沌前,天地万物之间存在空间上的矛盾。土家族认为混沌前天地万物皆存在^①。由于天地距离近,引起了天上人与地上动植物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主要通过行为过程、物质过程和心理过程(28.3%>16.7%>13.3%)表征(见表 2)。物质过程的“动作者”为天上人,“目标”为地上动植物,表征了天上人限制他们的行为或活动范围;行为过程的“行为者”为地上动植物,表征其受到天上人惩罚而主动缩减活动范围;心理过程的“感知者”为天上人,表征他们对地上动植物的不满。有益性过程主要通过行为过程表征地上动植物被赋予情感和意识。中性过程主要通过关系过程表征宇宙的空间关系,即天地距离近。从参与者来看,第一阶段天上人占比 37.1%,地上动物占比 31.5%,植物占比 25.7%,地上人占比 5.7%,天上人作为“动作者”和“感知者”,动植物作为“目标”,说明天上人比动植物权势大。

第二阶段:混沌后,补天制地,从混沌走向有序。此阶段以物质过程、言语过程和关系过程为主。物质过程占比为 66.4%，“动作者”为张古老、李古老等天上人,“目标”为烟袋、钉子、木棒等无生命特征物质和葫芦、豇豆等有生命特征物

①胡炳章:《土家族文化精神》,民族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2 页。

质,表征天上人善用工具补天制地造人,重建宇宙生态的主观能动性。言语过程占比10.4%，“言语者”“言语对象”都是天上人，“言语内容”体现了天上人合力重建宇宙的意愿。心理过程表征“感知者”天上人对混沌后的宇宙和造人失败的难过伤心。关系过程占比8.8%，表征天上云、星星、月亮等物质与生命有机体的紧密关系。从参与者数量来看,天上人占比96.0%，他们充当“动作者”“言语者”“受话者”“感知者”“行为者”等,具有强大的主观能动性和丰富的情感,承担重建宇宙的责任。

第三阶段:贪吃雷公,洪水泛滥,逐渐建立“惩恶扬善”的道德观。本阶段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和言语过程(52.5%>17.2%>12.7%)既表征生态有益性又表征生态破坏性,前期主要以破坏性为主,后阶段以有益性为主。物质过程“动作者”为地上兄弟和娘,“目标”为铁柜、铁锁、天上雷公,表征兄弟抓雷公的贪和狠;但是当“动作者”为好人雍尼、补所时,“目标”为娘和雷公,表征雍尼、补所的孝和善。心理过程“感知者”为地上娘和兄弟时,表征他们想吃雷公的意愿;“感知者”为天上人时,表征天上人要用洪水淹没地上坏人的决心,体现了双方的对抗心理。但是,当“感知者”“现象”为地上好人雍尼、补所时,表征他们对雷公的同情。前期言语过程的“言语者”和“言语对象”局限在同类生命有机体中,“言语内容”是要用洪水淹没地上人和关于雷公的吃法,表征地上人和天上人的矛盾;后期“言语者”和“言语对象”则跨越了空间和类别限制,“言语内容”是要救助好人雍尼、补所,帮助雍尼、补所成亲等,反映了生态主体间的交流由单维度走向多维度、跨类别,由对抗走向合作。从参与者数量来看,地上人的占比逐渐超过天上人(48.1%>42.9%),被赋予强烈的主观能动性。

第四阶段:兄妹成亲,人类延续,重建和谐共生的宇宙生态。本阶段主要由物质过程、言语过程和关系过程(40.3%>21.9%>15.6%)表征,体现天上人、地上人、动植物等生命有机体对宇宙生命延续的关切。物质过程“动作者”为雍尼、补所时,表征他们通过推磨子、烧火等,克服重重困难做人种,延续人类生命。言语过程“言语者”和“言语对象”包括地上人、天上人、动物、天、地等,“言语内容”是协助兄妹成亲、做人种和维持人类

生命。关系过程参与者包括人种、苗家、毕兹卡、客家、花等自然生命体和清风、山等自然非生命体,表征他们之间的亲密和谐关系,如客家、毕兹卡、苗家根同源。心理过程“感知者”为天上人、动物、地上人时,表征他们对人种和宇宙生态的整体认识逐渐深刻。

从及物性小句过程类型的分布来看,“人类来源歌”的物质过程表征了生命有机体天上人、地上人、动植物由空间冲突转变为延续宇宙生命的协同合作。心理过程反映了天上人、地上人、动植物等感知者由怨恨、畏惧转向关心和关爱。言语过程反映了交流对象由同类同空间的交流转为跨空间跨类别的沟通。关系过程反映了土家族先民对宇宙天、地、天上人、地上人、人种、动植物等的认识逐渐深刻,生命有机体之间的依存程度不断提高。参与者也越来越多元化,由天上人到地上人、动物、植物、天、地,他们共同作为“动作者”“感知者”“言语者”,合力维持宇宙生命延续与和谐发展。

三 《摆手歌》中“人类来源歌”的生态哲学观

“人类来源歌”四个阶段的及物性语义资源表征显示,土家族先民心中的宇宙自然不是孤立静止的物质个体,而是不断发展进化的共生体。《摆手歌》蕴含的生态哲学观与土家族先民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和文明发展程度紧密相关。因生存环境艰难,文明发展相对落后,土家族先民的生存与繁衍成为第一要务,他们总是从自身的生存经验角度观察、认识和想象周围的世界。故本文在“和谐”生态哲学观的指导下,结合语境探究《摆手歌》中土家族先民的生态哲学观。

(一) 以人为本的假定:从人类生存和繁衍的问题出发

《摆手歌》中土家族先民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宇宙生态的结构和演变等方面的认识都体现了“以人为本”,即从他们的生存和繁衍所遇到的问题出发。土家族先民将自然尊称为“天上人”,“天上人”既能限制地上动植物的活动,又能补天修地造人,还被赋予丰富的情感和“惩恶扬善”的原始道德,体现了土家族先民对大自然的崇拜、感激、敬畏和恐惧的复杂情感。他们认为宇宙自然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在不断演变

进化,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的:一是天上人、地上人、动植物等生命体之间的关系由冲突矛盾走向相互依存;二是宇宙环境进化得更适合生命的生存和繁衍,比如,宇宙空间的改善、动植物活动空间的调整、天地的修补;三是人种的进化,比如,地上人从高大、勇猛的“原初人”、野蛮、善斗的“神创人”进化到具备“惩恶扬善”道德观的好人。

(二)良知原则:惩恶扬善是生命有机体之间从冲突走向和谐的自觉条件

在儒家哲学中,仁是人的最高德性,是从天地“生生之德”而来^①。“惩恶扬善”的道德观是仁的体现,是维护自然界“生生之德”和宇宙和谐的根本。土家族人民十分重视“良心”,将其视为民族人性的本体和伦理道德的根本出发点^②。“人类来源歌”中的生态良知,是生命有机体之间从冲突走向和谐的自觉条件,是分层次、分阶段逐步建立起来的,体现了天上人、地上人逐渐具备生态良知,即“惩恶扬善”的道德观,进而促使冲突转向和谐。

(三)亲近原则:交流沟通是生命有机体之间从冲突走向和谐的重要方式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阐述了中国人以己为中心,按照亲疏关系逐渐往外推的过程^③。亲近原则也是“差等”的和谐,指以人为基点从不同维度分辨人与其他生命体和外部环境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人类来源歌”中天上人、动植物等充当“动作者”“感知者”“行为者”“言语者”等,被赋予情感和思想,是亲疏关系变化的前提。影响亲疏远近关系的维度,由生物类别、空间距离转变为情感投入和良知意识,而交流沟通是增强情感投入和良知意识的关键,是生命有机体之间从冲突走向和谐的重要方式。

(四)制约原则:制约与约束是生命有机体之间从冲突走向和谐的重要保障

“人类来源歌”中自然生命体经历了从外界的客观制约到主观的内在约束过程。天上人、地上人、动植物从受空间的客观制约,到受“惩恶扬善”道德观的主观约束,从被动制约到主动承担延续宇宙生命的责任,这一转变使生命体和非生

命体从冲突走向和谐。摆手歌由处于社会地位较高、能通天地和鬼神的梯玛领唱,引导人们积极向善、勤劳苦作,表明摆手歌是土家族先民世代传承、具有一定约束作用的“乡规民约”。这与国家级非遗项目土家族民歌代表性传承人向汉光关于摆手歌对人们具有制约和教育作用的想法高度契合。

“以人为本”的研究假定,“良知、亲近和制约”原则作为一个有机体系,充分反映了“人类来源歌”中土家族先民“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观:一是人与自然的相互制约,既承认自然的客观性和物质性,人不能脱离自然界而存在,同时又认为人是宇宙之精华,具有维持宇宙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责任;二是人与自然的互相包容,自然被尊为“天上人”,具有丰富的情感、强烈的亲和力和道德感,“惩恶扬善”是人与自然相互包容、宇宙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价值基础。总之,人与自然界是有机整体,不可分离。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有其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生态环境。“人类来源歌”蕴含的生态哲学观,体现了土家族先民艰难的生存环境和积极解决生存与繁衍困境的乐观心态。我们要提高对自然的科学认识,了解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规律。

结语

非遗文本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其中的创世神话蕴含着人们早期的生态智慧,对推进人类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借鉴和启示作用。本文为深入研究非遗文本中的创世神话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路径。一是和谐话语分析能够成为研究非遗文本中创世神话的新视角。“和谐”生态哲学观受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能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提供指导原则^④。二是和谐话语及物性分析框架丰富拓展了和谐话语分析范式。和谐话语分析提出的动因,是对产生于西方语境的生态批评话语分析框架是否适合中国语境的思考。生态批评话语分析主要从批评的视角,研究生态系统中消极和否定

①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33页。

②周兴茂:《土家族的传统伦理道德与现代转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3页。

③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8页。

④刘海霞,周亚金:《全球生态治理的困境与中国方案的构建》,《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因素。和谐话语分析主要从“建构主义”视角分析生态系统的“平衡、和谐、共生和互动关系”，以往和谐话语分析实践更关注话语的生态性，却较少探讨如何实现和谐的动态过程。本文以实证案例的形式，通过分析生命有机体之间关系的演变，探索了和谐话语分析注重整体性、系统性和动态性的本质特征，而不局限于对话语的生态性范畴分析。对《摆手歌》中创世神话的和谐话语分析，能为其他非遗文本中的创世神话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三是非遗文本由多种社会符号建构，其研究具有相通性。社会符号学家克雷斯

(Kress)认为，语言符号的分析范式可以为其他符号的分析提供参考^①。在社会符号学视域下，非遗是由语言(文字)、舞蹈、音乐等多种符号建构的符号系统，非遗文本则是符号系统的体现形式，具有可视化、稳定性、规律性。因此，从语言学视角研究《摆手歌》中创世神话的生态观，能为其他创世神话的研究提供启示。未来，还可以从音乐、舞蹈、动作等多模态视角，深层次系统研究非遗文本，让人们“更深地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②。

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 of Creation Myths i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ex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itivity: A Case of Tujia Ethnic Group's "Sheba Songs"

LIU Ying^{1,2}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416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pplies the transitivity system of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nd the ecosophy of "Harmony", construct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harmonious discourse and transitivity, expands the ecological attributes of process types and participant roles. It applies the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creation myths of the Tujia ethnic group, a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text, "Sheba Songs", in order to analyze its semantic representation of transitivity and ecosophy. In the creation myths of "Sheba Songs", mainly through the use of material clauses, mental clauses and relational clauses, the celestial beings, the men on the ground, animals, plants, and other entities are depicted as constructing a more harmonious ecological living environment, thereby reflecting the ecosophy of "Union of Heaven and Man". From the ecolinguistic perspective, the study of the creation myths in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an provide references and insights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transitivity system; creation myth; 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 ecosophy

(责任校对 朱正余)

^①Robert, Hodge, Kress. *Social Semiotic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

^②《习近平在陕西延安和河南安阳考察时强调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不懈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9日。